

《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

近代 中国的 历程

《文史知识》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

《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

近代 中国的 历程

《文史知识》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历程/《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8

(《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

ISBN 978-7-101-08772-7

I. 近… II. 文… III. 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4216 号

书 名	近代中国的历程
丛 书 名	《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
编 者	《文史知识》编辑部
责任编辑	刘淑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772-7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 ——

1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	罗志田
8	明定国是：背景与意义	马 勇
18	20世纪新中国的呼唤——《少年中国说》论析	张 惠
26	慈禧与戊戌变法	隋丽娟

—— 走向世界 ——

37	晚清：中国人怎样走向世界	王晓秋
46	中国形象在近代文学与传媒里的几个主要意象	周 怡
55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式学堂教育	尚小明
61	救亡启蒙与文化转移	叶 隼
	——比较视域里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与东方现代性问题	

—— 女界革命 ——

74	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女界革命——何震和《天义》报	刘慧英
84	晚清女权思潮溯源	夏晓虹
97	近代“新小说”中的妓女新群像	廖 敏
104	“自由大可结婚姻”——晚清婚姻自主的言论和实践	苏生文

—— 乡下人进城 ——

- | | | |
|-----|----------------------|-----|
| 113 | 近代小说中的“乡下人进城” | 何宏玲 |
| 122 | 1911：革命、秩序与社会阶层之异动 | 冯筱才 |
| 128 | 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城市下层民众的生存策略 | 王 笛 |

—— 晚清的上海租界 ——

- | | | |
|-----|--------------|-----|
| 142 | 租界与上海城郊农村 | 戴鞍钢 |
| 150 | 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 | 马长林 |
| 163 | 晚清小说中的上海租界形象 | 李永东 |
| 174 | 近代租界类城市的复杂影响 | 熊月之 |

—— 尚武的精神 ——

- | | | |
|-----|-------------------------------------|-----|
| 184 | “从军乐”与“祈战死”
——中国近代“尚武”精神的提出与乐歌创作 | 李 静 |
| 196 | 礼教建军与治军 | 李书源 |
| 203 | 甲午中日陆海决战 | 戚其章 |

—— 革 命 ——

- | | | |
|-----|------------------------------|-----|
| 215 | 八卦世界——辛亥革命时期谣言的制造与传播 | 瞿 骏 |
| 223 | 就“号”这一口
——国民革命中的口号政治与政治口号 | 尹 钛 |
| 231 |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孙中山 | 李吉奎 |
| 240 | 一个社会解体的时代和辛亥革命 | 张国强 |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

罗志田

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乱多于治，可以说没有十年的安稳日子；与两千年“传统中国”的治多于乱、总有一千多年的安定适成鲜明对照。过去许多人爱说中国是睡狮，发展停滞，似乎不很高明。但睡狮初醒，似仍类虎落平阳，外遇强权，尚难自保；内则试图“取而代之”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一般老百姓，恐怕还不如发展停滞时那样宁静。

近百年中国何以久乱而不治？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一个文化、社会、思想的重心。章太炎在1918年时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重要的是，“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矣”。胡适在同一时期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他在1919年感叹说：“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能保住盛名。”两人之所见，虽是民初数年之事，但揆诸后来的历史，这个现象基本是持续的。



章太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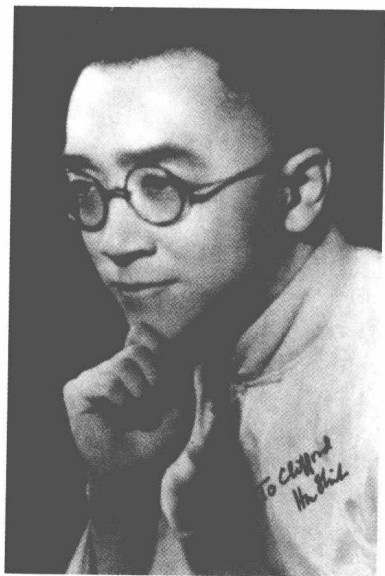
且章、胡二氏自己，亦在此循环之中。君不见民初太炎说此话之时，他本人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诸贤都还在壮年，就不得不让少年的胡适“暴得大名”吗？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的确，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的事。曾开一代风气的“新党”代表梁启超，就是在很短时期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摒弃，不得不反过来“跟着少年跑”。

胡适就曾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也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要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以温和著称的胡适如此，激进者自不待言。而胡适不久也重蹈梁氏的复辙。他得名后不及十年，亦旋即被一些也想西化但更年轻的新知识菁英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梁叔莹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

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和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

到1932年，胡适对于近代中国始终乱哄哄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知道了没有大家尊仰的“人物”在，乃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表象，大致与章太炎达成了共识。那时他认识到：中国那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近代中国何以久无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对君主制的信念又为堕落的清季朝廷所毁坏，再加上科举制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



得名甚早的胡适

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的知识阶级等等。这些见解大多有些道理,但也都有些“隔”。而且他说的有些因素如科举制度,恐怕正是过去两千年之所以能有社会政治重心的重要基础条件。

章太炎的解释更为深刻。他指出,这是因为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盖“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晚清从曾国藩到张之洞,对历史知识,素所储备,故尚能得力。民国人不习历史,恰如不习谱而妄行棋,则“成败利钝,绝无把握”,遂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章氏所说的历史,其涵盖远比一般人所认知者更广大,约略即其在清季爱说的国粹,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化。

的确,近代中国读书人因文化竞争失败,竞相学习西方,从西学为用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正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自身的立脚点一失去,就出现了国中人物“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现象。重要的是,章氏所说的“历史”,要大家都习才行。曾国藩、张之洞的时代,全国大多数士人都还未失其“故”,所以他们尚能占据中心。入民国则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已不习“历史”,即使如太炎等少数人习之,也不为大家所接受,自然不能占据那空虚的中间主干之位。

而全社会都不习“历史”,反映出国无重心的状态不能简单从任何一个方面解释。这一现象要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及西潮冲击之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大框架中进行探讨,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能引起思想的转变,而时人心态变化也可以反观社会的变动。

简言之,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

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崇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不仅一般老百姓要不断寻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其新和维持其新。可是新总是相对于旧的,一旦旧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为新。则既存的偶像转眼已旧,不得



彝伦堂，康熙帝御书匾额。皇帝曾在彝伦堂正中设座讲学。科举考中的进士，都要由状元、榜眼、探花率领，来到彝伦堂东门拜谢“恩师”，受“释褐簪花”之礼，脱下百姓衣，换上官服，并由国子监祭酒赐宴。昔日的学生们经过此番礼仪，成为王朝要员；帝国的核心价值将由他们落实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进国家的远近角落。若“国无重心”、秩序失效，或者士大夫们的主观认同发生了动摇，帝国何以永续？

不让位于更新者。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大家可接受的持续象征，于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现象就与近代中国同进退，成为一个持续的社会现象。

而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科举考试内容已重“新学”胜于“旧学”，中国腹地不能接触新学书籍者，便难以通过考试。实际上，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已与传统的士大不相同。

士的逐渐消失，和后来所谓“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士为四民之首，一身而兼“道统”和“治统”的重心，集议政与参政于一身，并联络和代表其他三民以“通上下”。故像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前者使读书人只想议政而不欲参政，通常也只能议政而不能参政；后者使一部分读书人干脆走进象牙塔，彻底疏离于农工商三民。

科举制的一个重要功能，本是养士以成“大夫”，可以治国平天下。有了士人

这一思想社会重心的存在，历代由边缘人打天下后，便能转换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科举制废除的一个结果，就是士与大夫的分离。民国官场之滥，即从为官不要求资格始。由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原处边缘的各社群开始兴起，并逐渐进据政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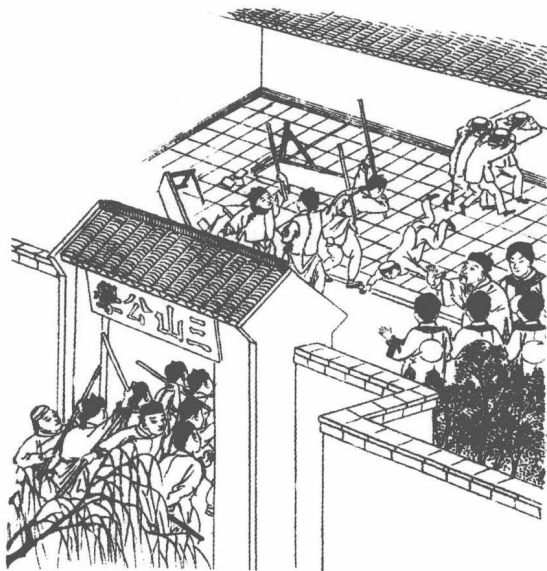
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读书人社群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与此同时，身处城乡之间和菁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青年，则颇能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崇新自然重少，青年乃成为天然的“政治正确”者。一些菁英读书人反向边缘知识青年看齐，世风为之一变。在此大趋势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且中国的事情更因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外国在华势力的广泛深入而进一步复杂化。近代中国任何重大的文化变迁和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屡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欺压者学习，究竟是文化失败所造成的对征服者既憎恨又摹仿，还是因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而自信尚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很可能两者皆有之）。无论如何，近代中国人为了自救而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



辟雍，清乾隆年间建成。辟雍，即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最高学府。每逢新帝即位，都要来此设座，讲经说法，行教化，宣扬国家礼义，重申伦理纲常。国家根本在此不断被重申、被强化。而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则动摇着清帝国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和礼仪秩序。

图片出自上海《图画新闻》，1907年。
清末新学堂兴起，改变了人们接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废科举、兴学堂，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在社会的流动渠道和上升途径。这些变化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时事画刊上不时有“仇学”、与学生、学堂冲突的报道。



真理，确有实在的轨迹。其学习的榜样，最初是更接近中国的日本与俄国，后来又经由英美而转向苏俄。在这一进程中，“以俄为师”持续的时间最长。

不过，近代中国人虽尊西崇新，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传统的影响在。其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故趋新大潮与尊西的结合只是钱币的一面，中国人激进的攻击锋芒，也可随时转而西向。西方文化优势在中国的确立，意味着反西方的努力也要用西方的观念来使之合理化。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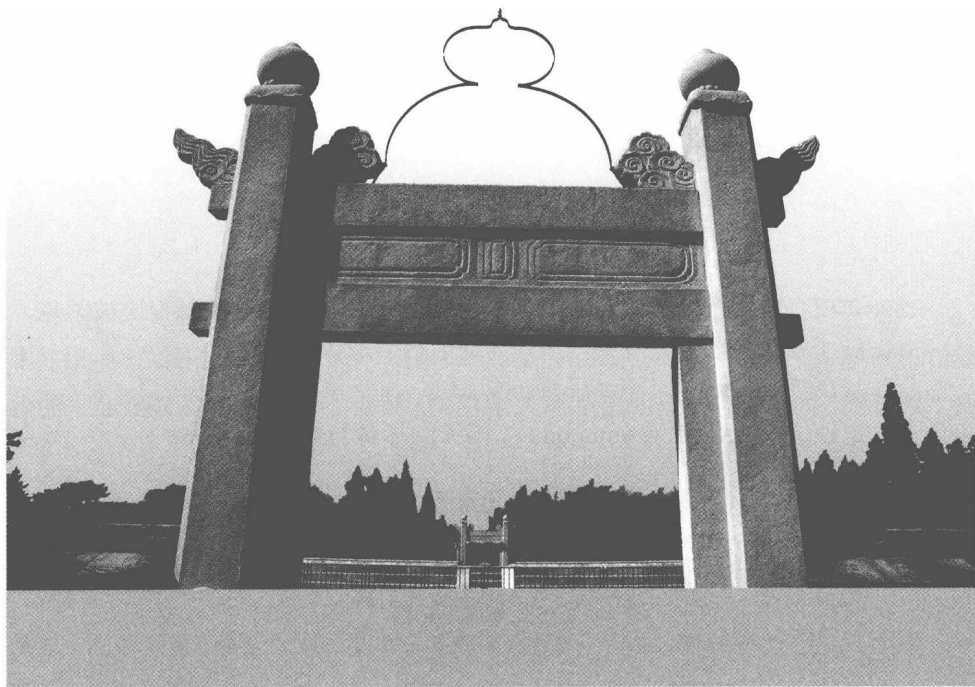
在此情势之下，民族主义乃成一股大潮。从社会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菁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方向，可藉此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位置，也可说是一个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性。从这一层面看，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自然非其他主义可及。

但是民族主义只能提供出路，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重心既失，边缘人打了天下后，仍面临是以自己为中心“独治”，还是重建一个社会重心来“共治”天下

的问题。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感叹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此语固有其特定的指谓，但多少透露出那种独治也难、共治又无所与共的窘境。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身也是在失去重心的情形下主要靠“收拾西方学理”而成型的。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的一大区别，即表现在其采取了包括激烈反传统和追求“超人超国学说”这样一些通常非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胡适在北伐统一之后仍说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已失败，即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再造文明”的目标并未实现。

从根本言，近代中国重心之失落，还是国人已失其故，缺乏一个重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即使“收拾”一些西方的学理，仍谈不上对外来思想资源的消化、借鉴和利用；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也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和政治的重心。重心不立，则乱多于治的现象必然反复出现。胡适所谓“再造文明”，正是要重建这样一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以今日的情形看，他提出的这个任务，恐怕仍有待完成。



社稷坛。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皇帝在此祭祀社稷，祈求江山永固。

明定国是:背景与意义

马 勇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起草者翁同龢很快被罢免,这并非意味着后党对帝党的胜利,而是改革力量对保守力量的“扫除”。而诏书本身“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创建京师大学堂,这其实才是诏书重要甚至惟一的内容。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郑重发布一道谕旨: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迺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当墨守,新法必当槟除。众喁尧尧,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

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挹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諭知之。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明定国是诏》，它不仅是戊戌年最重要的政治文件，而且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都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平淡无奇的诏书，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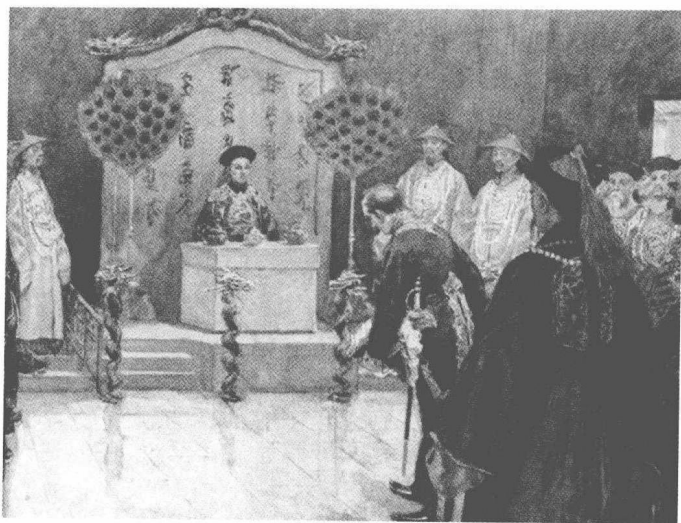
开启新时代

要想说清楚《明定国是诏》的意义，还要从其历史背景说起，要从那之前十几年的清廷政治发展中寻找秘密。

我们知道，光绪帝并不是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亲生子，皇太后的亲生子同治帝不幸于1875年初病逝，年仅十九岁。同治帝虽然已经婚配，但没有留下儿子，且同治帝为独根独苗，无兄无弟，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惯例由皇子继承，也无法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找其亲兄弟继承。不得已，清廷只好从最亲近的亲属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



慈禧太后手扶宝座照



戊戌变法以前，光绪帝接见外国使臣。

奕譞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

载湉生于1871年8月，他的父亲醇亲王为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的弟弟，所以从皇族关系论，载湉为慈禧太后的侄子。而从皇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皇太后的胞妹，载湉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甥。1875年2月25日，

年仅四岁的载湉正式继位，这就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帝。

在小皇帝继位之后，并没有亲政，而是养在宫中，接受教育，大清国的日常政务，主要由皇太后代为处理，所以叫做“垂帘听政”。

到了1886年，慈禧太后五十一岁了，小皇帝也满十五周岁了。在那个年代，五十一岁确实是个不小的年龄了，皇太后确实准备歇歇了。

经过两年悉心准备，光绪帝于1888年亲政，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就要开始了。这是传统中国王朝政治的规律。然而，这一点却没有顺利实现。

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大清国自1860年开始向西方学习，开始洋务新政后，至此时快有三十年了。三十年大致和平的发展，使大清国的实力有了很大提升，清廷内部的鹰派力量也就开始抬头了，先前开始容忍南边藩属逐渐脱离清国，到了这个时候，随着清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当然不愿日本图谋朝鲜，不愿东北亚陷入乱局。于是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一败涂地，原本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结果弄成这个样子。小皇帝的面子实在有点挂不住。

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后，一股新的变革思潮在国内酝酿，中国开始由先前三十年向西方学习变为向东方学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准备像敌国日本过去几十年那样，洗心革面，重新从头来过，这就是所谓“维新运动”的由来。

维新运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然而过了两年时间，随着经济的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的改革动力又开始衰竭。直至1897年底德国人背信弃义出兵占领胶州湾，李鸿章引狼入室向俄国人求救，俄国人却乘机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湾，空前的外交危机深刻刺激了中国人，一股更为强烈的变革情绪到1898年春天已经无法遏制，小皇帝的变革热情也就空前高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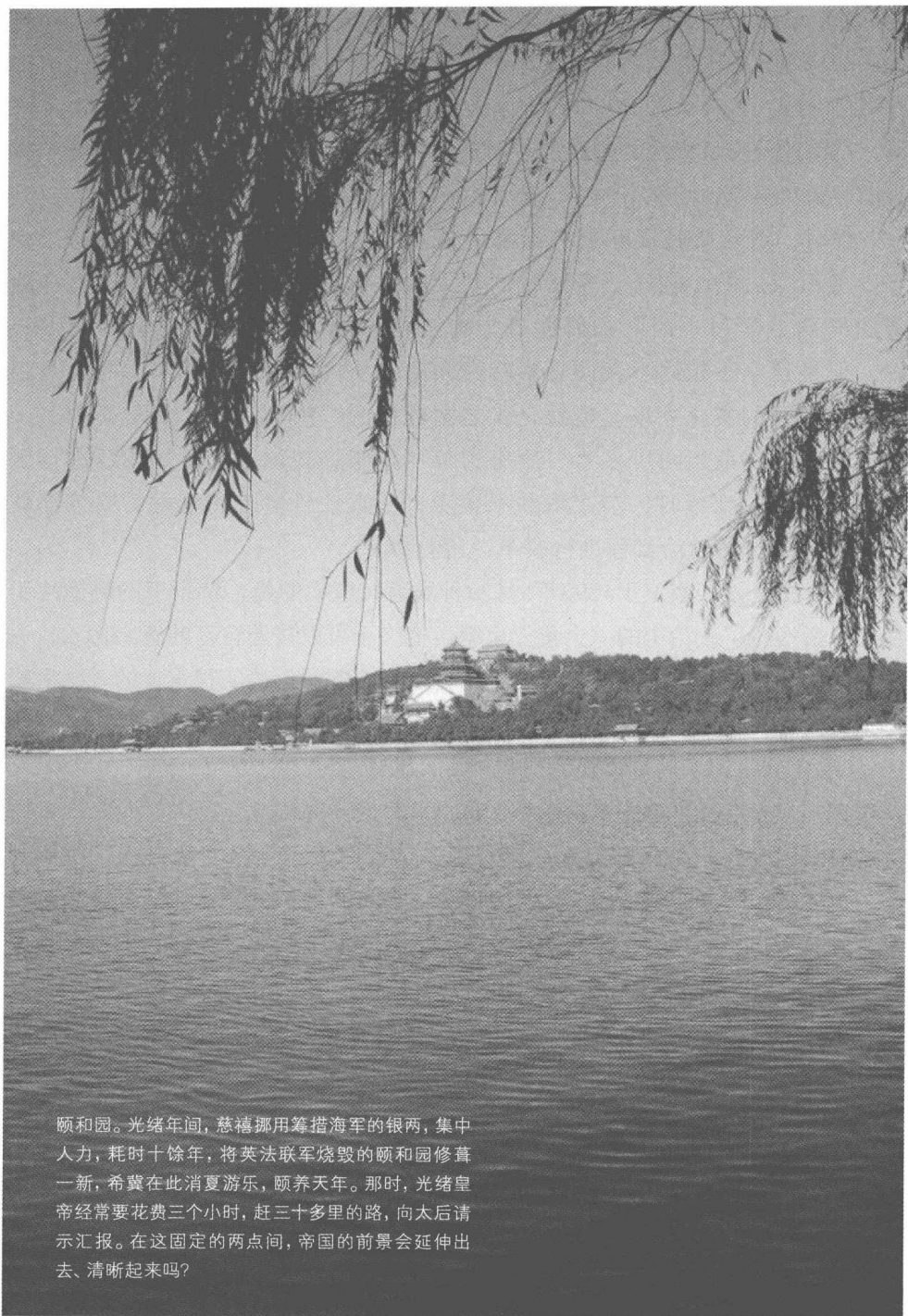
然而，清廷此时实际上的当家人是恭亲王奕訢。恭亲王是道光帝第六子，慈禧太后的亲侄子，光绪帝的亲大伯。恭亲王在过去几十年竭力推动清国向西方学习，因而被研究者誉为近代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的引领者。但是恭亲王始终不认同日本转身向西的明治维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也就是张之洞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当外交危机再度发生，康有为等一批年轻知识分子要求朝廷进行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时，恭亲王并不接受，一直劝告皇上和皇太后要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政治日程进行改革、进行维新。

不幸的是，恭亲王于1898年5月29日病逝；庆幸的是，恭亲王的病逝终于使小皇帝摆脱了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束缚，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政，一个新的时代终于可以开始了。于是有了这个并不起眼但确实很重要的《明定国是诏》。

《明定国是诏》后来被誉为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的总纲领，但实在说来，这份诏书只是一般性地宣示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预告成立京师大学堂。

诏书以为自甲午战败以来，中外臣工讲究时务，主张变法自强，举国同心，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诸如开特科、裁冗员、改武科考试、创建新式学堂等，然而由于国内许多地方还不够开放，论说莫衷一是，或以为旧章必当墨守、新法必当摈除。

从内容上看，这道诏书，虽然标志着百日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但内容却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除了决定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一具体事项外，不外乎是政府有意刷新政治，渴求人才，希望中外大小臣工能够体察政府的深意，各司其职，发愤为雄。在怎样对待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这道诏书立论平实，不偏不倚，既强调要博采西学之长为我所用，也反对徒袭西学皮毛食洋不化；既强调要以代代相传的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也反对徒蹈宋明儒学积弊，空谈性命义理。这样立论平实、不偏不倚的诏书，很



颐和园。光绪年间，慈禧挪用筹措海军的银两，集中人力，耗时十余年，将英法联军烧毁的颐和园修葺一新，希冀在此消夏游乐，颐养天年。那时，光绪皇帝经常要花费三个小时，赶三十多里的路，向太后请示汇报。在这固定的两点间，帝国的前景会延伸出去、清晰起来吗？